

◎ 何小莲

来华新教 传教士的 早期医学 活动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新教）传教的重要途径。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中国政府的禁令和澳门天主教势力的拦阻，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广州、澳门两地难以容身，只能在南洋各地向华人传教，间或在澳门、广州有些活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香港割让，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传教士顺势将活动据点迁移到这些口岸城市。1860年以后，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传教士活动扩大到沿海、沿江和广大内地，医学传教进入新的阶段。本文主要叙述1860年以前的时期。

一、马礼逊时期：医药传教事业的开拓

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到澳门。

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做翻译的同时，兼任西人中国语文教师，其学生中有一个名叫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是当时西医东传方面的重要人物之一，与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齐名。

在马礼逊来华期间，爱丁堡大学副校长贝尔德（Dr. Baird）请马礼逊代为调查中国贫民、病人、孤独、疯狂者等方面的情况。马礼逊转请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温斯顿代为调查。李医生就此写出专题报告，寄给贝尔德，同时登载于1817年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的《印支搜闻》（Indo-Chinese Cleaner）季刊上。这项工作，激起了李文斯顿致力于中国医药研究之兴趣。据李调查，其时中国之穷人主要病患概可分为两等：一为洁净（Clean）类，即以盲、跛、聋哑三项为主；二为不洁净（Unclean）类，即麻风等。诸病之中，眼疾最为普遍。或许是这个原因，传教士在初来之时多开办眼科医院。

1820年，马礼逊与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一诊所，主治眼病，兼治内外科疾病。他们不仅为穷人治病，还注意研究和考察中医的治疗方法。他们在诊所建了一个小型中文医学书籍图书馆，拥有中文医学图书达800册。他们还专门聘请了一位擅长中医中药之华人来诊所服务。诊所开办不及数月，已逾三百病者求诊。此为基督教行医施药之始。皮尔逊有时也来帮忙。这所医院并没有维持多久，因马礼逊1823年回国休假直到1826年，李文斯顿1825年后也离开澳门。马礼逊与李文斯顿的尝试，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们开设了华南也是整个中国第一家西医诊所，还努力寻求与中国本土医学（即日后习称为中医）的合作。

马、李开创的医疗事业，因郭雷枢的到来而有新的起色。

郭雷枢与马、李关系密切，对医药传教事业颇多助益。他于1827年以东印度公司医生身份来到澳门。经他努力，东印度公司予以有力赞助，使得马礼逊及李文斯顿之原有诊所进一步扩展。郭雷枢共诊治患者达4000人之多。除澳门之外，亦有各地乡邑人员前来求治。郭雷枢主持的眼科医院，因皮尔逊的离开而在1832年底关闭。郭雷枢本人在52年之后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还认为这所医院，特别是十年以后他建立的医药传道会，是他一生中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1828年，他还在广州开设了一家诊所。有人认为他所开办的医院是中国第一家眼科医院，也是西医事业在中国的开创之举，将他视作医学传教事业的先驱。

在马礼逊之后，还有一些西人医生和传教士在传播西医方面进行过努力。1828年，白拉福医生在广州开办了一家免费医院，后来柯克司医生加盟其中。这所医院规模不大，没有住院病房，但他们治愈了大量的患者。这所医院直到鸦片战争逼近才撤退到澳门。来自德国的郭士立（又译郭实腊，Rev. Charles Gutzlaff）与来自美国的雅裨理（David Abeel）两位牧师，在南洋一带及中国沿海活动时，也曾藉施医赠药为传播福音媒介。尤其是郭士立，他是一位多姿多彩的人物，一身兼为学者、医生、探险家，是初期传教士中著名人物之一。他在中国沿海航行传教期间，就向天津和江南一带的贫困阶层行医发药，以赢得人们的好感和信任。他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中，就表达了中国人对行医送药的渴求，并表示希望在一个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一所医院。

马、李、郭等人在澳门、广州所设眼科医院及诊所，并不是教会主持开办的，他们也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医药传教士。综观1807年至1834年在澳门、广州等地基督教人士所做之医药工作，虽然并不专业化也不是严格意义的医药传道工作，基本上是依附于东印度公司的基督徒医生之服务，至多可以称为在中国的平信徒传教医生，但这些医药先驱却在民众中产生的影响而深受鼓舞。他们到中国创办医院的行动，对于那些想到中国发展传教事业的英美教会组织无疑是个很大的启发。郭雷枢还向英美教会组织发出呼吁，请求继续向中国派遣医生，以满足中国方面缺乏医疗的需要，通过治病感动百姓，最终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二、伯驾眼科医院的开设及中华医务传道会成立

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9）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第一个牧师。他于183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医学和神学博士，取得医生文凭，受美部会遣派，于同年6月4日东来，历时143日始抵澳门，10月6日到广州，后折返澳门，并于12月12日南下新加坡习华文。在新加坡期间，他设一诊所，专为华人治病，从1835年1月到10月共治疗了一千多病人。

伯驾于1835年11月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他选择眼科，因为它最普遍并且中医对此束手无策。当时教会医生在中国最能产生影响的主要靠白内障手术，所以这个医局实际也是眼科医院。据伯驾给美国传教总部的第一份季度报告说，他的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成功治疗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士绅阶层中产生影响。在广州医院开办的头两个月内，麻醉还没有使用，他切除了一个巨大而危险的肿瘤。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病例。一年后，他为中

国病人做了第一例截肢术。1838年，有一个病人下颊生出肿瘤，伯驾医生为他成功地加以切除。1844年，伯驾第一次为一位病人作了膀胱结石切除术，在当时这类疾病极为常见的情况下，第一次成功所具有的示范意义是很大的。1847年，伯驾将麻醉术介绍到中国。麻醉的使用更使他在短短几个月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就无怪乎有人评价伯驾用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伯驾很重视病案记录和管理，每一位病人的情况都有详尽的记载。自1835年11月4日医院开设，至1836年11月4日，医院就诊病人达2152人次，一年之中诊治的眼病有47类，其他病例23类，女性癌症病不治者有5宗。因为每个民族都有特定的病症，普遍性的病症在不同的地区也有程度不同的差别，中国也不例外。在伯驾之后，“中华医务传道会”的每个医院都对重要的病例进行记录并报告，以为医学研究提供宝贵的文献。1837年，经他挑选，一些中国青年开始跟他学习医药学和英文，并在医院里帮助做配药以及手术助手方面的事情，这就是伯驾在他的报告中提到的第一个“医疗班”。

广州医院在短时间里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伯驾的大获成功，得到了各阶层人上的信任与尊敬。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二百至三百不等，亦有多至六百人，院务日趋繁忙。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共为12000多名患者解除痛苦。该院在伯驾医生主理期间，亦聘用华人以为传译及配药之助理。此外，郭雷枢、安德逊两位医生也常来帮忙。广州的伯驾医院和澳门的眼科诊疗所是外国人最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这是西方医药在鸦片战争后向中国大规模输入的前奏，它使中国医学从此开始经历医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

伯驾的医院1840年6月因鸦片战争爆发而关闭。1842年11月伯驾回到广州重新恢复业务。1855年因伯驾兼有外交事务，医院由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接替。1856年，医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毁。1859年1月嘉约翰在广州南郊建新院，更名为博济医院。伯驾曾在1840年6月到1842年10月间，先后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一些城市游说，向商界和医学界发表演说，宣传在中国从事的医药传教事业。这使他得到大批捐款，为其在中国长期从事传教活动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

郭雷枢和伯驾从一开始就认为医学传教如果要很好地开展下去，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在这一方面最早进行努力的是原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1838年2月21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华医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的正式成立大会。郭雷枢任主席，伯驾等4人任副主席。在英美两国与会人士中，除裨治文牧师、伯驾医生为美部会遣派之教士，其余皆为商人或公务员。



马礼逊

这一时期是医学传教的准备和开创阶段。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传教士活动最初只能局限于澳门和广州以及华人聚居的南洋等地，他们也不敢以传教士的身份公开活动。但当别的传教士只能寄居在美国商人的公司里，从事《圣经》的翻译等传教准备工作时，他们毕竟可以进行医疗活动，和中国基层社会有所接触。这一阶段是传教运动最艰难的时期，布道工作进展缓慢。医学方面，除了传播牛痘术，最高成就是在澳门开设了两个诊所，在广州开设了一个眼科医局。到此时为止，西方医学所取得的那些新成就，还没有真正传到中国来。但传教医师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毕竟建立了一批教会医院，同其他如教育、出版活动一样，医疗活动初具规模，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新开口岸城市的医学传教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新教）的医药传教事业，向其他通商口岸扩散开来。1842年前东来专向华人传教的63个传教士中，除了去世或因病归国不能来华的人以外，能继续在华工作者共28人，均先后撤离其南洋或澳门之工作所在地，继而分往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口岸工作，自始在中国乃获立足之地。西洋医学传播于广东一隅的情势也随之改变，医学传教中心由此北移。五个通商口岸中，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日渐显露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传教士注目的中心。

上海开埠后，首先在上海建立教会医院的是伦敦会的医师雒魏林（Dr.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又译为洛克哈特）。他曾担任伦敦医学学会会长，热衷于医药传教。1839年1月抵达广州，并曾到澳门从事



伯驾



嘉约翰

医学传教工作。1840年赴舟山、定海一带。1843年，经伦敦会同意，他关闭了在舟山开办了半年的诊所，于1844年2月抵达上海，随即开办上海最早一家西式医院——仁济医院的前身——雒氏诊所，地址在南市附近的一所中国民居里。诊所虽然条件简陋，但因免费义诊，前来求治者络绎不绝。因业务拓展的需要，这所医院经多次搬迁扩建，一度称为山东路医院，最后中文名定为“仁济医馆”（1932年正式定名为仁济医院）。其建设费用主要由英国商人、侨民捐赠和香港医学会募捐。医院开办极为成功，在很短的时间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求诊。雒魏林在1844年5月到1845年6月的报告中说，有10978人光顾医院。1849年上海医院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同时，也有大量的瘾君子来到医院戒烟，雒魏林为一些人成功地戒除毒瘾。伦敦会除这所医院外，在城内教堂里也开设小诊所，每周二、五开诊服务。在1857年雒魏林离开上海后，伦敦会委派合信任仁济医院院长。以后又有柯林斯（R e v . Collins）、韩德森（James Henderson）等人相继主持该院工作。仁济医院在开办的最初13年中，即从1844年至1856年，医治病人13万人次，1875年达56624人次。仁济医院在施医之外影响最巨者为儿童种牛痘的工作。西方种痘之术最初施行于广东，其传入上海，是由仁济开其先河，经雒魏林亲自培训助手后，影响及于附近江浙城镇。1926年，英国富商、德和洋行老板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去世，遵其遗嘱，医院获得了200万两白银的赠款，医院的英文名称也因此改成雷士德医院。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新教医师也来到上海。美国浸信会的伯顿(G. W. Burton)于1852年到上海从事医务工作。1848年，美南监理会传教士泰勒(Chas. Taylor)到上海开设诊所，他是美南监理会在华传教的开创者，五年后回国。1854年由凯利(Rev. Kelley)医生接替他的工作。1855年，美国圣公会的菲什(M. W. Fish)医师到上海，在圣公会教堂附近设诊所行医传教，1858年弃医从政。另外，大名鼎鼎的内地会创建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曾于1854年到达上海，也做了一些医务工作。

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之下，在上海出现了施医公局一类免费的医药机构，这主要由上海一些慈善人士所开办。施医公局聘请了许多中医专家坐堂，凡是眼科和外科方面的医药都免费提供。施医公局还为本市不同的药店轮流发放中药设立了一笔资金。这吸引了大量的患者，在每个门诊日都有300—500人前来就诊，特别是在夏天的几个月时间，人满为患。

在宁波，捷足先登的是美国浸礼会医生玛高温(Daniel J. Macgowan, 1814—1893)。他既是来宁波的第一位传教医生，也是美国浸礼会在华开辟传教事业的第一人。他于1843年11月到达刚刚开放通商的宁波，在城内办起诊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1845年4月，他重新建院，此后一再扩建，而且还从国外得到一批捐赠，有医疗器械、书籍、图片、解剖模型等。1848年，这家医院接受病人4617人次。由于多方面原因，医院几度停办，在此期间他就去巡回施诊。玛高温在1846—1848年度报告中说，他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一种可以戒除烟瘾的中药疗法，应用后果真有效。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玛高温还对宁波的中国医师进行有关人体解剖和生理知识的特殊演讲，希望能激起他们对西方医药的兴趣和认识。1854年玛高温还发行了一份名为《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的中文杂志，初为半月刊，后改月刊，介绍西方科学、医学和宗教。玛高温试图让中国医生也学习西医、使用西医。但当地人救治疾病时大部分人还是使用中医药，信任外科手术者并不多(眼科除外)。实际上，当遇上霍乱、伤寒、麻疹等疾病流行时，教会医生也束手无策，只能给予诸如樟脑酒、芥子药膏和“补力药酒”之类的简单药方以作安慰。1844年6月，美国长老会的麦嘉缔夫妇(Davie B. McCartee)到宁波传教，在自己的家里开了诊所，也经常义务出诊。他们在宁波收留了一个孤儿，后送到美国纽约学习医学，学成回国后一直为教会作医疗工作，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留学的女医生金韵梅。1855年，伦敦会医生派克(William Parker)从上海到宁波，建立了一所医院。他的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不幸的是，与他同行的妻子于1859年染霍乱而死，他也因此离开宁波回国。

在厦门，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于1841年赴鼓浪屿，1842年有舜为仁(William Dean)、文惠廉(Rev. Boone)、

麦毕烈特(Thomas Macbryde)、委理华(Walter Lowrie)赴鼓浪屿及厦门。雅裨理、文惠廉与孔聪(Henry Cumming，一译高明)医生一道于1842年6月在鼓浪屿开设一小型诊所，诊所就设在雅裨理的家中。这间诊所不为医务传道会所认可，因为孔聪医生不属于任何差会，但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热情为病人治病，同时也进行布道。这间诊所后迁移至厦门。1843年，美国长老会医师赫伯恩(James Curtis Hepburn)来到厦门，与孔聪一起工作。诊所旁边的一座房子专门租来供病人住院，这是第一家开始有床位的教会医院。来求诊的人越来越多，从1844年2月1日到来年7月1日，收治病人1,862例。后由于健康原因，赫伯恩返美。他于1859年重返远东，被派赴日本，成为日本西医传教的先驱。除此以外，这一时期先后来厦门的传教医师还有几位，但都因为健康问题而被迫中断他们的活动。因此在厦门的医药传教事业，像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时断时续。

福州于1844年开始与外国通商，它的教会医院出现得晚一些。1848年2月，美国美以美会的怀特(M. C. White)医生首先到福州开诊所，1851年威尔纳(Wiley)来继续这里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国。1850年英国圣公会的韦尔顿(Welton)到福州，在一个佛教庙宇办诊所。福州医药传教工作是从1870年以后才开始稳定、持久的。

总的来说，1860年以前，宁波、厦门、福州三个新辟口岸，其医药传教情形与上海、广州没有根本区别。只是与上海、广州相比，这三地教会医务工作规模较小，其影响也相对较小。

四、粤港医学传教的新发展

1842—1860年间，广州、香港地区的新教医学传教发展较快，日益成熟。

在广州，由伯驾创办的博济医院，经北长老会嘉约翰(John Kerr)发扬光大，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嘉约翰是美国传教医师，他早年在费城的杰佛逊医学院学医，1854年受长老会的委派来到广州，在伯驾的眼科医局当医生，同时为长老会筹设惠济医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嘉约翰回到美国，一边继续在母校进修，一边为在中国医药传教进行游说和募捐，并陆续购买了一批医疗器材，战争结束后他又重返中国。广州的眼科医局和惠济医局在战争中都毁于战火。1859年，嘉约翰在广州南郊重新开设了一个医院，这就是中国著名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

嘉约翰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医生的配合和支持，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黄宽(?—1879)。黄宽，广东香山人，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医学硕士。他于1847年随美国教师布朗到美国留学，两年后转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1857年学成回国。回国后，他首先在香港开办诊所，后来迁到广州。黄宽接手原

由伦敦会医生合信主持的金利埠医院，以此为基础继续开展工作。黄宽因医术高明，又是中国人，所以远近前来求医的人甚多，到1858年4月，也即他经营医院的四个月中就有求诊者达3300人。他的医院发展很快，1859年，床位增加到80张，可容纳430位住院病人，这时门诊病人已达26030人次，并且有四位助手在培训。可以说，黄宽对西医在广州的流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859年博济医院开张后，黄宽经常到博济医院协助嘉约翰工作，在这里，他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例胚胎切开术。广东向来以患膀胱石为多，嘉约翰曾以截石术出名，但是在他以前，黄氏早已经割治过33人。从1863年起，黄宽还参加了南华医科学学校培养中国学生学习西医的教学工作。在嘉约翰回国休假时，医院的管理和医务责任就全部落在黄宽等中国医生的身上。

在广州，还有其他一些传教医生的活动。由美部会派来的传教医师波乃耶 (Rev. Dyer Ball, 1796-?) 也是一位早期来华医生，他早于1839年就在新加坡来到澳门，1843年到香港开办诊所，行医传教。1845年到广州，建立教堂、诊所、学校等。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他不得不退居到澳门，他在广州的医学事业遭受了损失。另外，由美国长老会派来的哈巴安德医生 (Happer, 1818-1894) 于1851年在广州开办惠济医院，哈巴安德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1844年来华，先后在澳门、广州两地行医、办学和传教。

香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大部分传教士和侨民便选择其作为暂栖地，战争后又有大量移民涌入，使得狭小的港岛变得拥挤不堪，加之气候炎热和潮湿，经常流行疟疾、痢疾和黄疸病。病人不仅有原岛上的中国居民，还有英军士兵。第一批香港移民为疫病袭击，死亡率高达31.5%。1843年，为适应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疗需要，英军舰船上的军医院全部迁至港岛上。港英当局开始委派医务官员，同时在香港成立公共卫生和清洁委员会。1843年6月，合信来到香港主持第一个教会医院。1844年6月合信的报告

表明，有大量的病员来就诊，远远超过医院的接纳能力，截至1844年5月大约有病人3924人，其中有566名住院者。1848年初，伦敦会派赫希伯尔格来香港负责医院工作，并新开了两家诊所，其一设在九龙一个中国基督徒开办的学堂里，另一间则设在伦敦会的一个教堂里，这里常有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前来看病。两间诊所都是一个礼拜开诊一次。赫希伯尔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后转到厦门。1845年，在香港的医务官和传教士组织成立“中国内外科学会”，由英国海军医生塔克 (A. Tocker) 任会长，合信任秘书，成员共7人。该学会主要目标在于加强医药学方面的交流，对关乎大众健康的诸如流行病等问题展开讨论。学会下设图书馆以及博物馆。他们和内地教会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定期召开医学讲座会。

从1807年到1860年新教传教士在华的早期医学活动，以1842年为界标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传教士还没有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一般说来对中国文化还比较尊重，他们所进行的活动，还属于常态下的文化传播活动，态度还比较谦和。1842年以后，情况有很大不同，传教士倚恃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态度也比较强横和霸道。两个阶段，中西文化态势有很大不同，传教士活动在中国引起的反响也很不一样。但是，在医学领域，这两个阶段则没有太大变化，社会反应也基本一样，从总体上说，西医传播比较顺利。

(责任编辑：朱榕)



上海山东中路145号仁济医院

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早期医学活动

作者: [何小莲](#)
作者单位:
刊名: [档案与史学](#)
英文刊名: [ARCHIVES AND HISTORY](#)
年, 卷(期): 2003, ""(1)
被引用次数: 2次

引证文献(2条)

1. 余新忠 [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评杨念群著《再造“病人”》](#) [期刊论文]-[近代史研究](#) 2007(6)
2. 郝先中 [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 [学位论文] 博士 2005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aysx200301011.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aadeafd4-e36b-4b81-b42b-9e4d008f651d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